

中華學術叢書

湯志鈞 華友根
承載 錢杭 著

西漢經學與政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湯志鈞

華友根

承載

錢杭著

西漢經學與政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中華學術叢書

西漢經學與政治

湯志鈞 華友根 承載 錢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75 插頁 2 字數 248,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7-5325-1782-9
Z·255 平裝定價：13.20元

序

儒家經學的「定於一尊」，始於西漢武帝；自此以後，經學成爲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

漢初，面臨秦末動亂給社會經濟造成的嚴重創傷，「民無蓋藏，人無作業」，急須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採取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

無爲而治，不是消極的「無爲」，而是積極的有爲，它在漢初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政治的穩定，保證了經濟的發展，史稱：「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文錢累巨萬，貢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二]

漢武帝時，「中外乂安，公私富溢」，政治上中央集權，思想上也要求與之相適應，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正能適應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從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以「統紀」而明

[一] 《史記·平準書》。

「法度」。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詩》《魯詩》、《齊詩》、《韓詩》、《書》、《易》、《禮》《儀禮》、《春秋》《公羊傳》五書成爲「法定」的儒家經典，博士也就限於儒生。這些經書都是今文，從此，今文經學如日中天，煊赫一時。

元、成、哀、平，日趨衰落，今文經學也因傳者的迷信、煩瑣，隨着西漢王朝的衰落而衰落。原在民間流傳的古文經學却由校勘異同而到宮廷爭立；劉歆的「移讓太帝博士」和王莽對古、今文的態度，可以看出它「托古改制」，利用經典作爲其政治欺騙和思想控制的工具。

西漢是儒家經學「獨尊」的開始，也是今、古文傳播、論爭的開始，它的「獨尊」和「傳播」、論爭以至興替，無不和當時的社會、政治有關。

—

我從事中國經學史的研究，已有幾十年了，起初只是搜集資料，鉤釘文字；接着疏通整理，辨析異同。感到經學的盛衰、分合、爭辯，往往與當時封建政治相關聯，五十年代末葉，我曾就此撰文闡述。又考慮到經學史中各該學派的傳承、興衰，也往往與當時的政治有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自漢京以後，垂兩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二)，它只從學派的繼承關

(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

係及其某些特點着眼，沒有考慮它在不同時代的區別，失之簡單；但「漢學」、「宋學」畢竟還是經學史上「互為勝負」的主要學派。宋學和政治的關係比較明顯，論者也多；而漢學則或者宣揚「微言大義」，或者注目「音韻訓詁」，系統論述它和社會政治關係的書轉不多見。為此，決定從兩漢和清代入手，亦即從「漢學」入手，試圖比較系統地闡明它和當時政治的關係。恰好這兩個時代，正是儒家經學的「定於一尊」和「江河日下」的兩個時代。

《近代經學與政治》，於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後，朋友們希望我再鼓餘勇，把漢代經學寫出，從而決定撰寫本書，並獲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歷史組的贊同和支持。

本書各章節的撰稿情況是：

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節、第八章

湯志鈞

華友根

承載

錢杭

第二章第一節至第四節

第三章至第五章

第六章至第七章

全書由我通讀定稿。其中有的章節修改較多，有的章節和我原來意圖稍有出入，但能言之成理，也不再強求「統一」了。此外，湯仁澤曾寫有部份初稿，今併說明。

湯志鈞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

序

三

目 錄

序

第一章 黃老之治和「儒家獨尊」

第一節 漢初的黃老之治 ······ 一

第二節 關於「儒家獨尊」 ······ 三

第二章 董仲舒和尊儒崇經

第一節 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 ······ 二

第二節 君權神授 強幹弱支 ······ 四

第三節 選賢考績 改革吏治 ······ 六

第四節 法《春秋》 崇《公羊》 ······ 五

第五節 五經博士和今文經學 ······ 六

第三章 經學的傳授及其特點

目 錄

第一編	第一章	《詩》的傳授	八五
	第二節	《尚書》傳授	九三
	第三節	《儀禮》、《周禮》、《逸禮》傳授	一〇〇
	第四節	《易》的傳授	一〇五
	第五節	《春秋》傳授	一一〇
	第六節	《論語》、《孝經》傳授	一一一
第二編	第四章	儒經博士的遞嬗及其選拔	〔三〕
	第一節	五經博士的選拔	〔三〕
	第二節	執教傳經	〔三〕
	第三節	「循行天下」	〔四〕
	第四節	從「備顧問」到「參國政」	〔四〕
第三編	第五章	從「罷鹽鐵」到「論石渠」	一七一
	第一節	由「罷鹽鐵」而引起的統治思想之爭	一七五
	第二節	宣元之際的經學	一八四
	第三節	陰陽災異和政教合一	一九一

第四節 石渠閣會議和傳統經學的分化 二一七

第六章 西漢禮制建設之一——「廟議」 二三九

第一節 議「罷郡國廟」 二四一

第二節 議京師宗廟迭毀之禮 二五五

第三節 王舜、劉歆對「廟議」的總結 二七七

第七章 西漢末年的經學與政治——劉向、歆父子 二八九

第一節 劉氏父子的經學成就 二八九

第二節 劉向經學活動的政治內涵 二九三

第三節 劉歆的沉浮與悲涼 三〇七

第八章 西漢的終結和今古文學的消替 三一三

第一節 今文經學的衰落 三一三

第二節 古文經學的興起和王莽改制 三一五

第一章 黃老之治和「儒家獨尊」

第一節 漢初的黃老之治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強盛的時代，也是儒家思想取得獨尊，并使儒家經學成爲封建文化正統的時代。

漢初，面臨着秦末動亂給社會經濟造成的嚴重創傷，「民無蓋藏，人無作業」，「天下苦秦久矣」，不能再蹈秦朝橫征暴斂、嚴刑苛法的覆轍了，急需安定社會，恢復生產。還在入關之初，劉邦就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一)採取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

根據《史記》記載，曹參任齊相時，就採取了無爲而治，並取得了恢復生產的成效，「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前一}

(一) 《史記·高祖本紀》。

九三），蕭何卒，曹參爲漢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當時百姓對漢初無爲政策加以歌頌：「蕭何爲法，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1]

曹參相齊，尊重「善治黃老言」的蓋公，其治用「貴清靜」的「黃老術」，從而一般人稱漢初的「無爲而治」的統治術是「黃老之術」或「黃老之學」。

漢初，總結秦亡的歷史經驗，并對「無爲而治」統治模式提出比較系統理論的是陸賈。當劉邦桀驁地認爲「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時，陸賈即反唇相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寧使秦王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又「論爲治之道」，書曰《新語》。儘管今本《新語》（弘治本）也有後人攬雜的東西，但基本上不是僞作，反映了漢初陸賈的政治思想。

陸賈認爲：「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以近。」^[2]他從鞏固新王朝統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檢討秦朝滅亡的原因，說是：

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權，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

[1] 《史記·曹相國世家》。

[2] 《新語·無爲》。

也。〔二〕

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三〕。

「秦非不欲爲治」，但它「以刑罰爲巢」，「務勝不休」，以致「事愈煩，天下愈亂」，終於無所不爲而無所爲，「二世而亡」。他從秦王朝的覆滅總結出教訓，提出「無爲而治」的統治模式。

「無爲而治」，也正是秦漢之際歷史轉折的必然產物。漢朝建立之初，面臨的是殘破不堪的社會，田地荒蕪，經濟凋敝，劫後餘生的人民對秦政的苛殘記憶猶新，流亡山澤，「民失作業」，當務之急是收攬人心，招撫流亡，撥亂反正，恢復經濟。也就是所謂「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而與之更始」〔三〕，於是「蠲削煩苛」、「約法省禁」。

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削法令妨吏民者，廢除挾書律。高后元年（前一八七），廢除三族誅、妖言令。文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於前元元年（前一七九）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次年（前一七八）除誹謗

〔二〕《新語·輔政》。

〔三〕《新語·無爲》。

〔三〕《史記·蕭相國世家》。

法，十三年（前一六七）除肉刑法，又除宮刑。景帝也守之勿失。

在經濟上，「便萬民之利」，招撫流亡，開放公田，輕徭薄賦，放鬆對工商業的控制。文帝屢次減免田租、徭役，重農息民，休養生息。無爲而治還從農業擴大到工商業，惠帝時，弛商賈之律；文帝後元元年（前一六三），弛山澤之禁。

漢初的無爲而治取得很大的成功，政治的穩定，保證了經濟的發展，史稱文帝「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¹⁾。

這裏，不準備縷析無爲而治的興敗得失，只想就下述幾個目前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第一，無爲而治，是否是沿襲秦舊，因循秦制。

有人認為：「漢初政治，既主張無爲，自然也主張因循。所以一切禮樂制度，多沿襲秦人之舊。」其實劉邦起先曾採用六國官制，《史記·淮陰侯列傳》：「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連敖爲楚官名，見《史記索隱》引「李奇曰」。《漢書·曹參傳》：「曹參以軍功，遷爲執珪」。注引如淳曰：「《呂氏春秋》：『得王員者爲執珪』，古爵名也。」可知他曾採用各國遺制。後來有因有革，官制绝大部分改而採用秦制，並非無爲因循。其次，劉邦進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²⁾。蕭

(1) 應劭：《風俗通義·正失》。

(2) 《史記·蕭相國世家》。

何的收取秦丞相、御史府所藏圖書，是認定它的檔案價值，作為後來沿用秦制的參考。那麼，這種積極行動，也不能說是無爲因循。

第二，無爲而治是消極的無爲，還是積極的有爲。

首先，從陸賈《新語》中，可以看出他提出無爲而治，不是不要「政」和「權」，而是「有爲」。他說：「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要求「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¹⁾，要求有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的政治局面。又說：「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應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耆老息於堂，丁男耕耘於野，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²⁾它不是放任自流，無所作爲，而是主張有一個不給人民增加煩勞而能統治廣土衆民的國君，這才是「君子之爲治」。所以 he 說：「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³⁾他是吸取了秦亡的教訓，「與民休息」，以達到安定秩序、恢復生產，鞏固新王朝的目的，事少政寬，「君臣俱欲休息於無爲」，「無爲」其實「有爲」。

(1) 《新語·懷慮》。

(2) 《新語·至德》。

(3) 《新語·無爲》。

其次，從上述劉邦入關初的「約法三章」到蕭何的取秦朝圖籍，以至漢初的一系列省刑之舉，說明他們既看到「天下苦民久矣」，又從圖籍檔冊中尋求利弊；既瞭解到當時的人口、賦稅、倉儲，也看到秦朝的政典、法典，一方面沿用秦制，一方而又執行從寬。它不是消極的因循，而是積極的有爲。

第三、「無爲」源於道家，尊奉傳說中的黃帝和道家的老子為學說創始人；但漢初的「無爲而治」不是老、莊哲學的繼續，而是吸收了儒家思想。因而，漢初的「黃老之學」，是以道家學說為基礎，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的。

儒家「法先王」，道堯、舜，陸賈說：「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然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擾民之心，然天下治。」^{〔一〕}推崇虞舜之「治天下」。他又把人類歷史分為「先聖」、「中聖」、「後聖」三個時期，說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生」；「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後來「綱紀不立，後世衰廢」，「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二〕}纂修篇章，垂諸來世。^{〔三〕}「先

〔一〕《新語·無爲》。

〔二〕《新語·道基》。

「聖」指上古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后稷、夏禹、皋陶等，「中聖」指周文、武、周公，「後聖」似指春秋戰國時期，亦即孔子以後。他不是崇古非今，而是闡明不同時代產生不同政治措施。他以綱紀不立的「後世」，揭露五經、六藝，他是吸收了儒家思想的。

儒家講仁義，講仁政，《新語》中有不少言及仁義的地方，如《道基》：

聖人懷仁杖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

夫謀事不并仁義者，後必敗。

《輔政》也說：

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尊。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

至於專論立行本仁義的《本行》更說：「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當然，《新語》所論仁義，與孔子的言仁、孟子的仁政並不相同，但它強調「行以仁義爲本」，應該說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也可說他是熔儒家的「仁義」於道家的「無爲」之中，以積極的「仁義」改造消極的「無爲」，從而收到「無不爲」的功效。

「無爲」之摻雜儒家思想，是和漢初無爲政治在學術領域中的開明性有關的。當時，黃老之學極盛，王鳴盛說：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

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鄧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丘望之等皆宗之⁽¹⁾。

漢初君臣崇尚黃老，黃老之學成爲社會上的主流思想，但並不因此排斥其他學術流派，對其他學派的存在和發展，也不干預。

劉邦滅楚，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弦歌之聲不絕，還是講習禮樂，對新朝廷並不信任。然而，劉邦並未加以殺戮，反而禮葬項羽而去，以示尊重。十二年（前一九五），「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²⁾。成爲帝王祀孔之始。惠帝親幸傳儒家《易》學的田何草廬。《史記·禮書》稱：文帝好道家之學，不喜儒家繁文縟節，「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但他遺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爲置博士。當時諸侯王競相聘賢招士，如淮南王劉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³⁾。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

(1) 《十七史商榷》卷六。

(2) 《漢書·高帝紀》。

(3)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